

## 书评阿南友亮著《中国革命与军队：近代广东的党、军、社会关系》

石川祯浩  
(京都大学教授)

◎ 原文刊载于「日」『中国研究月報』中国研究所、第 67 卷第 5 号、2013 年、32～34 页。

◎ 袁广泉 译

著者阿南友亮现任东北大学副教授，是一位活跃于学术界的政治史、中共党史年轻学者。本书是在此前研究成果（博士论文）基础上改写并重行调整结构而成，涉及年代为 1920 年代前半期后约 10 年左右，区域为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运动的地区之一广东省东部（东江）。该地曾有彭湃在国共合作时期领导农民运动，国共合作破裂后，中共又建立过革命根据地（海陆丰苏维埃）。本书内容结构，按目录所示，卷首《序论 从军队看近代中国》提示研究目的；随后列五章，分别为：一、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军思想，二、农民自卫军和早期“党军”，三、海陆丰苏维埃再探，四、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的形成，五、东江苏维埃兴亡。结论部分总结各章，并就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作了展望。具体而言，第一章概述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实际建军前曾有过怎样的革命军（或社会变革与军队的关系）设想。在此基础上，分别就 1924—1926 年（第二章）、1927—1928 年（第三章）、1928—1929 年（第四章）和 1929 年以后（第五章）各时期共产党在东江的军事组织（第二章又称“党军”）、实际斗争状态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进行详细分析。研究中国革命而引入军事视角，日本学界长期以来尚无专著问世，故本书出版可谓学界期盼已久。

本书在广泛收集并细心解读资料前提下，对相关问题从多角度作了细致论述。但通篇主张却极其明快，即就 1920—1930 年代的东江而言，共产党的军队（红军、赤卫队等）在该地开展的活动——包括其前国共合作时期的“党军”、“农民自卫军”在内——并非如中国主流历史观点所主张的那样由“社会变革”（土地革命、农民运动）派生、扩大而来。如此，则原有的固定观念——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等社会变革，贫苦农民大众支持共产党并加入革命军，由此发展起来的军队最终取得革命的军事胜利——被彻底颠覆。

也就是说，从著者所发掘的当时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报告看，由于共产党掌控当地的力量极弱，未能以有效方式进行如土地革命等社会变革，也因此，不可能产生保卫土地革命果实的动机。而红军事实上是由外地人组成的不惜掠夺的雇佣军，农民则依靠、利用红军，顶多以散漫形式加入可能为自己带来好处的土著组织（赤卫队），而几乎无人参加转战他乡的红军正规部队。得不到补充的红军部队则在战斗中逐渐被削弱。

尽管如此，共产党何以在一定时期内依靠武装割据而得以生存？对此，著者指出，共产党的军事活动是以广东尤其是东江特有且根深蒂固的区域、宗族抗争（械斗）为基础的。换言之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，表面上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，但实际上多为弱小势力（小姓）对依靠实力控制了区域社会和市场的宗族（大姓）的抵抗运动，因而与所谓“阶级斗争”相去甚远（p. 297）。本书大部篇幅用来描述那些决不符合“阶级斗争”论的实例。

有关 1920 年代广东农民运动含有浓厚的械斗要素，本书也参考的蒲丰彦等的研究已有明确阐述。而关于党的基层组织与农村传统社会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共生关系，同样以 1930 年

代鄂豫皖闽西根据地对象的高桥仲夫著《党与农民——中国农民革命再探》(研文出版,2006年)也曾以共产党档案为据予以明确指出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,本书的研究是重点在军事方面继承已有研究成果,并将其更加细致地应用于东江。从更大方面讲,此前有关革命运动研究的普遍意识——军事往往被看作政治的变数,而中共的军事胜利乃其政治领导得宜的佐证——在本书中被颠覆。

著者多方努力收集的丰富“革命历史档案”中的实例记载和实地调查记述(pp.288—291),以及随处展现的军事学见解(武器近代化及枪支在社会流散的意义),都加强了分析的说服力。比如,在当时的中国,虽说枪支在地方社会大量流散,但近代武器如来复枪、机关枪等却较为集中,以杀伤力极弱的火器、梭标、大刀等终究无法面对装备近代武器的势力(国民党军、有实力氏族的民团)进行所谓武装斗争。这也暗示着,武装斗争要如曾经的太平天国那样获得迅速发展,在二十世纪已不再可能。

本书还指出,在地主被驱逐后的海陆丰所发生的不是土地再分配,而是佃农继续耕种原租种的土地,他们不纳租而成为富农(pp.200—203)。这对理解不少中共革命根据地何以总是存在所谓“富农问题”,极具启发意义(pp.381—384)。

此外,本书还指出,尽管都是东江共产党组织,但其中海丰的干部因有澎湃等许多活动家而占优势,其他地区干部(如古大存)则相对处于下风(pp.358—359、372—373)。

不过,读到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反复描述共产党活动的盛衰起伏(因在开展活动的农村无法培植超越地缘、血缘的阶级意识,共产党军队尽管勉强组织起来并实行割据,但却不得不采用极其接近土匪、械斗的传统活动原理,最后走向衰亡),且不说笔者的感受,一般读者恐怕也会自然产生疑问:就这样不成样子的党和军队,为何能生存下来,而且最后战胜了国民党军队?

实际上,在研究手法和结论都与本书相似的前引高桥著作,也曾受到同样的质疑(如《亚洲社会文化研究》第10号[2009年2月]载丸田孝志书评)。假如中共及其红军在1930年代被彻底剿灭,高桥著作和本书的论述足以说明其理由:原来如此!然而事实是,中共及其红军并未被剿灭。

的确,本书《结论》也提示道,在中国,即使不依靠社会变革,也可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军事力量;而军队一旦发展到相当规模,总有可能持续扩展实力。既然著者的旁征博引已从逻辑上证明,共产党实施社会变革不可能加强其军事力量和动员能力,那么,接下去是否需要为其军事力量和动员能力何以得到加强作出解释,或至少提供一定线索?

如果说军事力量、动员能力的强弱完全是敌我相对而言,那么,将各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强弱和社会关系与共产党方面进行比较,也应是可以考虑的方法。本书重点分析的是共产党的部队,因此几乎没有涉及国民党军队组织的基础。但从著者对地方社会情形的描述,很容易推测国民党军队也应有同样来历或背景。那么,二者相逢乃至对抗时,是什么因素决定力量平衡、此长彼消?这也需要作出回答。

另外,著者涉猎共产党档案既然如此丰富,则是否透过这些档案对共产党的组织属性有所认识和收获?本书利用其广东部分的《革命历史文件汇集》(不知为何,本书皆作“文献汇编”),笔者作为中共党史研究者也将其置于案头。且不说其内容如何,笔者常有如下感慨,即如此小组织、小事,值得以文件形式逐一向上报告吗?尽管在组织和动员民众方面存在诸多局限,但对只有数人的支部或数十人规模的军队都随时留下报告,而且既好批判别人,也善作自我反思——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。

该书所引用现场报告的对象,多为数十人至一、二百人的组织。当然,土匪不写报告,国民党的组织、军队既不会如此不避繁琐地报告现状,甚至也不做反思。在通过档案透视共产党的某种凝聚力和组织能力时,是否也可发现足以改变血缘、地缘等当地社会原有力量结

构的某种要素（或其萌芽）？或许有人会反诘说，被不识字的农民四面包围，文字报告再多又有什么用。但笔者仍期待著者充分考虑此点。

最后，关于著者着力否定的革命运动图景——民众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社会变革”、“土地革命”激励而行动起来并形成了军队——，虽然中国的党史、革命史研究仍未彻底放弃，但随着近年研究的进展，那些既非宣传也非学术研究的著述，正在被逐离历史研究的主流。

以血缘、地缘等当地传统社会学原理为分析对象的何朝银著《革命与血缘、地缘：由纠葛到消解——以江西石城为个案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和试图探明中共在江西苏维埃动员能力实际状况的黄道炫著《张力与限界：中央苏区的革命（1933—1934）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1年）等，都从与该书相近的问题意识出发试图超越此前的革命史叙述（当然结论不同）。本书试图批判的中国的研究成果，似多产生于1980—1990年代。但著者年轻有为，希望今后多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研究潮流交流、交锋，以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。以本书所反映出的研究能力看，这对著者绝非难事。